

張曉明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正本清源

蔡子玲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出席香港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指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近年來有人誤解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反對派對此更是竭盡歪曲誤導之能事，其目的是為挑戰中央權力及特首地位、否定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造勢，以便篡奪香港管治權。張曉明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意義重大，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不僅澄清了坊間對特區政治體制的一些誤解，廓清了反對派散佈的迷霧，更是有利於推動特區政制在基本法的軌道上運作，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

張曉明指出，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是。不搞「三權分立」是基本法起草有關規定時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張曉明從四方面解讀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特點。

香港不是國家 不適用「三權分立」

第一，張曉明指出，香港是地方政權，「三權分立」則建立在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對香港最多只有參考價值，不可能適用。有人誤解或歪曲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背後的思維邏輯是將香港視為一個「主權國家」，但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都是來源於中央的授權，其政治體制與國家的政治體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僅是特別行政區內部的一種治理體系，也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三權分立」不適用於香港特區。

2008年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時訪港期間，對包括特區主要官員在內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負責人講話時，提出「這個管治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

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的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這顯示香港特區的政制不是「三權分立」，在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存在中央的權力。習近平提出香港特區的三個機構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就是體現中央對香港特區這三個機構提出的要求和希望。

特首具有超然於三權的特殊法律地位

第二，張曉明強調，行政長官在特區整個政治體制中處於核心位置，這是香港特區行政主導體制最大的特點。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雙首長」身份和「雙負責制」使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起着聯結樞紐作用。

反對派攻擊張曉明的言論等同將特首奉為「封建皇

帝」，凌駕法律之上，又聲稱三權分立「一直都唔度」云云。實際上，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回歸前不是，回歸後也不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特首有雙重負責並非新事物，基本法亦寫明特首憲制地位、與三權之間的關係、權力及規限，她反駁有人指張曉明說法等同特首不用守法，批評那些人是「為批評而批評」、「無限上綱」，稱「任何有常識嘅人士都唔會得到呢個結論」。

的確，任何有常識的人士，都會注意到張曉明說的是「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其中的「超然於」用得十分精闢，這完全不同於回歸前港督「凌駕於」、「高踞於」三權之上的殖民獨裁性質。英國統治香港時期的《英皇制誥》規定港督大權獨攬的地位，要求全港官員和居民服從港督；《皇室訓令》則規定，行政局和立法局都是諮詢性質，港督對這兩個機構有完全的控制權。

張曉明指出，香港特別政治體制「廢棄了原有政治體制中的糟粕元素，特別是殖民統治色彩、港督大權獨攬等。」可見，反對派攻擊張曉明的言論等同將特首奉為「封建皇帝」、凌駕法律之上，不僅違反常識，而且暴露了他們回歸前對殖民獨裁港督畢恭畢敬，奉為「皇帝」，一副奴顏媚骨，但卻對回歸後行政長官的特殊法律地位恨之入骨，反對派的殖民奴才面目令市民鄙視。

行政長官負責制的最大原則是行政主導

第三，張曉明指出，行政管理權相對於立法權處於主導地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權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關係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相對於立法權涵蓋面更大，影響更直接，作為更主動。

香港基本法雖未寫出行政主導的文字，但是它充分體現了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在長達四年零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過程中，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和研究，最後終於求得一個最大公約數，確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政治體制是行政長官負責制，這個體制的最大原則是行政主導。

實際上，翻閱歷史，也可以得到很多啟示。二戰後成立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議會權力很大，內閣不能得到議會的有效支持，使得施政低效無力，人民日趨不滿。戴高樂在民意的強力支持下，革除濫用議會權力的弊端，通過法律規定確定了議會對政府的必要配合，結束了政府軟弱無力的狀況，開創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穩定繁榮。

行政主導不會妨礙立法權和司法權正常行使

第四，張曉明指出，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互相配合，司法獨立。講行政主導並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權獨大，不是說立法會要放棄對行政機關的監察責任，更不會妨礙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正常行使。

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的目的是為了將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完全著眼於二者的對立，所以基本法又規定行政與立法之間的互相配合，配合就意味着二者之間要互相協調、互相支持，同心協力將特別行政區的工作搞好。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政權，能夠擁有司法獨立在全世界是罕見的，這充分反映出中央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也讓香港能夠延續其法治精神的基礎。

面對挑戰 化壓力為動力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務) 劉穎賢博士

在成長路上，同學時刻都會遇到新轉變，包括學業、人際關係、家庭生活等，而新轉變往往帶來壓力。不過，壓力並非來自事物和處境本身。事物和處境會否對個人構成壓力，視乎我們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和處境。面對壓力，有人會選擇退縮或者迴避，這些做法短期內可能有舒緩作用，但稍後壓力會再次浮現。與其整天受壓力困擾，同學們何不積極面對？

同學應對自己有合理期望，不要對自己抱有過分要求。同學亦要接納自己也會犯錯，更重要的是多欣賞自己的長處和接納自己的短處。當遇有學習或適應困難時，同學可以找朋友、家人、老師、學校社工或其他適當對象傾訴。這樣既能疏導情緒，也能協助自己整理思路，更仔細地分析情況，早日解決問題。同學可以嘗試從多角度思考問題，避免「非黑則白」的極端思想，不妨回想以往成功的事例，告訴自己：「我也可以做到！」或「情況會好轉！」

我們應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經常做適量的運動（例如緩步跑、游泳、踏單車）。當受壓力困擾時，可以嘗試有節奏地慢慢呼吸、舒展筋骨、放鬆肌肉、默想或暫時拋開煩惱等，這些方法都有助調節心境，舒緩壓力和抗衡情緒低落。

其實，教師和家長的關心、支持和鼓勵對學生處理壓力尤其重要。家長可主動關心子女的感受，每天多抽時間與他們傾談，討論學校生活，了解他們在學習和與人相處的情況，並給予適時與適切的安慰和支持。家長要經常鼓勵孩子，建立他們的自信，並教導他們與人相處之道，幫助孩子面對壓力、學習有效管理情緒，分析及運用解難的方法，並在有需要時主動尋求協助。家長要了解子女的實際能力和需要，透過與子女一起討論，共同訂立具體可行的學習目標。教師可加強培養同學注重身體及精神健康的意識，鼓勵學生互相支持、互相接納。

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能幫助學生勇於面對困難。可透過生命教育或安排適切的生活體驗，讓學生提升自己的能力感和信心，從中掌握抗逆力、正向及多角度思考和解難能力，也可為學生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工作坊或講座，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強項，加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教師不妨主動了解學生的感受及學習的困難，並一起討論共同面對和跨越困難的方法，可減低他們對應付新轉變、新挑戰的憂慮。

當壓力無法紓解時，通常會出現一些壓力警號，例如會表現出悶悶不樂、焦慮不安；思維及態度會出現消極的想法；對身邊事物不再感興趣等。若一旦發現學生出現壓力警號，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應即時向專業人員如輔導人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尋求協助。

政府應借Uber推動的士市場改革

城市智庫研究員 于承忠

科技創新吹起的士市場改革的號角！Uber由美國、歐洲各地席捲到香港，引發社會對交通運輸市場的廣泛討論。不久前警方針對Uber司機採取法律行動，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浪不僅集中暴露了市民對現時的士運營的各種詬病，更折射出社會對優質和高端交通運輸服務的渴求。對此，筆者認為政府應以其以法例、保險等各種理由去壓制市民的消費需求，倒不如借此契機檢視現行取酬載客的法律，對的士運輸市場展開變革，與各持份者如的士牌持有人、車行、保險公司以及司機等共同商討一個各方可接受的方案，為香港出租車行業帶來一條出路，以此回應社會的需求。

其實，隨着經濟發展和市民需求不斷提升，政府對於改革大眾運輸系統一直都不遺餘力。例如，於港島區經營的電車公司和兩間擁有專營權的巴士公司，令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風光的人力車日漸式微；風光一時的中巴退出專營市場，既有市場機制推波助瀾，但更重要的是當時政府介入市場，修改法例和開放市場雙管齊下，使整個大眾運輸系統得到了健康的發展。

筆者觀察到，近年政府對於「八折的士」、「電召貨車」、「call的士App」等處於灰色地帶的市場行為並未有太多的干預。「八折的士」為市民帶來較便宜的車費，「電召貨車」方便攜帶多件或大型行李的使用者，而「call的士App」使乘客對於候車時間有更好的把控。事實上，警方今次以「法例」、「保險」等理由，對Uber司機採取法律行動，的確令部分市民對於警方的做法感到不解。當然，在釐清關於第三者保險、取酬載客的問題前，政府確實有必要採取一切措施保障市民人身財產安全。

作為優化的士市場的措施，政府可考慮各種可行的方法，如高級租車服務、全港的士租車平台（由易志明議員提出）、或者是發牌予部分合資格司機，以限時或限定路線的經營方式，容許少數受規管的車輛提供比現時的士更優質的載客服務。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新科技如Uber不僅顛覆本港的士市場，更對全球的租車服務帶來衝擊。政府迴避這一浪的發展，恐怕非長遠之計。

設立「一帶一路」中企投資委員會正當其時

白冬紅

鑒於「一帶一路」沿線情況多複雜，筆者建議國家層面可考慮設立「一帶一路」中國企業投資委員會（以下簡稱「投資委員會」），根據我國對外合作戰略目標，統籌指導中國企業在相關國家的投資佈局，同時為企業提供相應諮詢服務，幫助企業獲取必要金融支援，協助企業規避各種風險，並與國家有關部門建立協調機制，有力保護企業海外投資利益及人員安全。如此，企業「走出去」前景可期。

國家層面統合支持不可或缺

「一帶一路」建設以經濟外交為着力點，力圖構建區域國際關係新格局。企業是該戰略執行尖兵，其投資成敗對「一帶一路」建設至關重要，國家有必要予以統合並給予全方位支持。

以其他地區做法為鑒，二戰後美、日、法、德等國均在推行自己的經濟外交戰略時，動用國家資源統籌扶持本國企業對外投資，達至國家和企業雙贏。與此同時，美國為贏得對蘇聯冷戰勝利，先是通過馬歇爾計劃將西歐納入其戰略體系，隨後又在世界其他地區選擇利益攸關國家實施大量經濟援助，通過經濟融合促進外交目標之達成，收效不凡。其時恰逢美國本土產能飽和甚至過剩、亟需擴展海外市場，於是1950年代美國在其企業國際化過程中建立了海外投資的政府保障體系，為企業在境外建廠和跨國併購提供資訊分析、市場協調、投資擔保、併購信貸調節、企業經營支援乃至外交協助、安全保護等一系列服務，有力促進了本國企業全球化發展，也使自身外交戰略獲得堅實支撐基礎。日本於上世紀70年代採取和美國一樣的做法，將拓展本國國際影響力和促進企業國際化兩大目標有機結合，相得益彰。而上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力圖擴大其在國際舞台上的獨立話語權，時值法國國企面臨生存困境，於是法國政府支持大型國企有選擇地向境外擴張，甚至動用國家信用為企業做信託擔保。在這樣強大的支持下，法國大型國企進行了一連串境外併購，既增強了自身實力，也如願提升了法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近年來雖然在戰略層面大力提倡國內企

業「走出去」發展，積極鼓勵企業海外投資，但在具體操作上缺乏足夠的相應配套支援及保護措施，使得企業應對風險能力薄弱，一些項目折戟沉沙。如2011年西亞北非動盪，當地中資企業疏於預判形勢，未能規避風險，損失慘重。同年，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在緬甸發展一直稱得上順利的密松大壩工程被該國政府突然叫停，前期數億美元投資回報無望。上述兩例個案表明，企業「走出去」若無國家各方面保駕護航，很容易陷入困境。應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成立投資委員會，建立健全企業海外投資政府保障體系。

全方位保障企業投資「一帶一路」

習近平主席在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講話中強調，要「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作為其首倡的「一帶一路」當然要率先實踐之，獲取成功認同後，可為其他區域合作做做標杆，對世界繁榮與和平意義重大。

毫不諱言的是，在各方角力爭奪影響的國際現實下，「一帶一路」建設絕非易事。作為宣導者的中國必然是最主要的實踐者，必須動員自己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全方位保障企業在該區域投資，才能有所建樹。筆者建議，新設立的「一帶一路」投資委員會可從以下幾方面着力：

第一，為企業提供投資諮詢，規避潛在風險。在利益至上的世界舞台上，海外投資絕非一馬平川的坦途，難免會遭遇荆棘坎坷。「一帶一路」涵蓋亞歐非64個國家，詭譎政治、動盪地緣、衝突法條、恐怖襲擊、差異文化都可能給海外投資致命一擊，使企業的辛苦努力

付諸東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才能處變不驚，應對有策，進退自如，為自身爭取最大權益。客觀地講，企業對經濟形勢、市場狀況有能力做出較精準判斷，但對上述風險單憑一己之力很難預判，遑論預案規避，投資委員會應承擔相關諮詢服務。

第二，幫助企業獲取金融支援，豐富融資管道。對國內有意投資「一帶一路」企業，投資委員會可與國內有關部門積極協商，通過發放優惠貸款、提供投資及進出口擔保、優先核准發行企業債、先行上市、靈活選擇投資幣種（周邊或選人民幣、中東或選美元、中東歐或選歐元）等多種方式，增強企業融資能力。

第三，協調動用外交資源，支援企業參與構建「一帶一路」。領導人和政府部門代表團出訪時，投資委員會可申報儘量安排有意隨行的企業高管參加，為其提供高層次的活動舞台。另外，我國230多個駐外使領館構成一個龐大的網路體系，可和它們建立日常聯絡，為企業提供豐富的資源支援，包括政策資訊資源、公共關係資源、組織人才資源、安保救助資源等。

第四，協調國家各相關部門，保護企業投資利益及人員安全。「一帶一路」中有些國家政局較為動盪、社會秩序較亂，投資企業面臨財產損失甚至員工人身安全都會受到威脅。投資委員會可協同相關部門，儘快形成一套操作性強的應對機制，運用綜合手段有力幫助企業解決遇到的各種麻煩，改變目前單一依靠外交管道的狀況。

第五，指導企業調整經營理念和方式，履行社會責任。投資委員會可通過宣傳培訓，使企業明白要參與構建和諧「一帶一路」作為投資當地的應有之義。在經營中踐行有關「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理念，確定合理的利潤區間，不追求暴利，不以利潤的最大化為最終歸宿，以便在自身業務得到發展的同時，造福當地民眾，建立為人所稱道的企業形象，讓所在國切實感受到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主張所帶來的好處。這樣，才有助於國家對外戰略目的之達成。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近日狄志遠先生退出民主黨，退黨信中雖然不可能詳細說明與民主黨的各種恩怨分歧。不過，猶記得狄先生曾在國教和政改問題上，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勸誡其黨員及市民理性接受方案，將矛盾降溫。當時黨派內部出現嚴重撕裂，狄先生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因而埋下他今天與民主黨分道揚鑣的導火線。

內訌不休 應勢退黨

黨派內訌，黨員離心，狄先生退黨之舉正正



■狄志遠強調理性務實溝通路線，認為政爭拖累香港發展。

搖擺不定 非民主黨之福

反映民主黨已非過去的兼容並蓄、和平理性，甚至變為為選票而激進。無可否認，民主誠可貴，但激進反對派正是騎劫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願望，爭取生存的空間的寄生蟲。激進盲反雖能取悅一小部分選民，或能在立會中爭一席位，卻反不出一條與中央順暢溝通的渠道，更絕對反不出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的機會。可惜！這無可否認卻是民主黨非法「佔中」後近一年的寫照。道不同不相為謀，與其作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禍港禍民，還不如另謀出路。所謂塞翁失馬，狄志遠先生壯士斷臂，焉知非福。

立場搖擺 不得民心

更甚者，除了激進，民主黨近年更擺出一副諷刺他們致命的搖擺姿態。2010年，民主黨曾就政改方案與中聯辦溝通協商。不過到了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民主黨卻又倒轉槍頭，拒與中聯辦作任何商談，加劇社會矛盾。可是最近，民主

黨又以懸崖轉石之勢向中央釋出善意，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煥會面。雖意料之外，但其為選票見風使舵之舉卻是情理之中。

現時特區政府由於反對派的「拉布」和「不合作運動」導致寸步難行，在行政立法關係欠佳之下，最終社會、市民甚至各政黨只會因此受害。所以，和衷共濟，冷靜協商的政改作風，雖然買少見少卻最見務實。一個成熟的政治體系必須尊重平衡不同界別持份者之間的意見及訴求，而一個懂得政治藝術，能夠堅持政黨底線為市民爭取合理權益之餘，又能平衡各界達至共贏的成熟政黨，更是濁流中的清泉。狄先生「夫途途知返，往哲是與」的態度，除了是狄先生之福，亦是民主黨的重要啟示。



何俊賢